

## 重访扬·米达尔笔下的中国山村

[瑞典]魏佩理

方杰译

“那是非同寻常的时代，学生们每个星期天早晨都会走到最近的报摊买上一份《晚报》，读一读扬·米达尔的文章，好让自己的观念能跟得上潮流。扬·米达尔曾是那个时代的精神领袖，而今天要对其所扮演的角色作出正确评价则非一件易事。那时的中国是伟大的典范，人民公社、集体的力量——大团结在新建的水井和梯田上成为现实。柳林村成了这一切的象征。”(林德奎斯特)<sup>①</sup>

### 一个开创性文本，一种新文类，革命

从多方面来考量，扬·米达尔的《来自一个中国山村的报告》(以下简称《报告》——编者)都是一本极具影响力的书。首先表现在它被译成二十多种语言，而且其英语、瑞典语、德语和日语文本出了好几个版本。世界各地的人们怀揣着这本书(扬·米达尔，1994)纷纷拜访那个叫做柳林的中国山村。当《报告》英译本最初出版的时候，评论家们在《卫报》和《芝加哥论坛报》等主流报纸上纷纷发表文章进行评论。一些著名编辑和汉学家，如埃德加·斯诺和《纽约时报》记者哈里斯·索尔兹伯里，都对扬·米达尔赞誉有加。在其法文译本出版后，颇具影响的人类学家和结构主义创始人克劳德·列维-斯特劳斯宣称，《报告》是试图解读现代历史的第一部民族志研究著作。德高望重的法国汉史学家谢和耐(Jacques Gernet)声称：“在我所读过的描写共产党中国的书里面，这是最好的

<sup>①</sup> 此处根据英译转译，原文为瑞典文。——译者注

一本。”<sup>①</sup>

该书的成功并非仅仅止步于其对汉学专家、学者和新闻编辑的影响，《报告》还开创了一种崭新的文学样式。米达尔这本书的成功发行激发了先贤书局<sup>②</sup>安德烈·希弗林(Andr  Schiffrin)的灵感，他打算和美国、英国、德国、意大利、法国、瑞典和丹麦的主要出版社合作，共同发行一整套“乡村问题”系列丛书——“先贤乡村系列”。(奥尔松，第57页)这一系列在国际社会中引起了极大反响，其中大部分也被译成数种其他语言，而且几乎每一本书的标题里都有“报告”二字，与米达尔的那部开创性著作相呼应。(奥尔松，第58页)<sup>③</sup>

这部著作在其他方面也具有重要意义：其出版正值冷战的严冬，西方的反共情绪极为强烈，那时很难意识到一种左翼的反文化正在形成，可是扬·米达尔的《报告》的出现恰到好处，成为众多燃起轰轰烈烈的第三世界激进主义的火花中的一朵。其法文本出版于1964年，意大利文和美国版出版于1965年，德文本则出版于1967年。《报告》描写的是毛泽东掌权之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。米达尔描述的中国与今天因莫斯科审判而遭受玷污、充斥集中营和斯大林恐怖的苏共截然不同。诚如历史学家科林·马克拉斯所言，扬·米达尔帮助创造了“具有人性的中国的形象”(马克拉斯，第186页)。

直到1967年再版后，这本书才在米达尔的祖国瑞典获得成功，而这时它已经蜚声世界。不过当《报告》在瑞典再版时，其发行范围之大几乎超过了它在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的表现。《报告》在这个不到八百万居民的国家里卖出了24 000本。同一年，瑞典的毛泽东主义政党便显出雏形。扬·米达尔几乎在一夜之间成为一位极具影响的政治评论家，他组建了一个年轻能干的班子，创办了一本有影响的左翼评论杂志《文化前哨》(FiB Kulturfront)。1968年，扬·米达尔又成为瑞中友好协会的主席。这一协会是瑞典毛泽东主义党的前身“共产主义同盟(马列)”(Kommunistiska F bundet Marxist Leninisterna)的诸多委员会之一。<sup>④</sup>瑞典的许多青年要感谢米达尔使他们产生了政治觉悟，而不少激进作家领袖也

<sup>①</sup> 以上引文录自瑞典的“中国旅游”(Kinesisk Resa)。

<sup>②</sup> 先贤书局(Pantheon Books)也是米达尔之父，著名经济学家、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贡纳尔·米达尔的出版社。是父亲向其子扬介绍此书局及安德烈·希弗林。

<sup>③</sup> 米达尔这本书也引发了另一体裁：“中国乡村研究”，可参看著名售书网站亚马逊(Amazon)的分类栏目(listmania)同一标题下的书目。

<sup>④</sup> 在20世纪60、70年代，毛派分子对瑞典社会各方面都有重要影响。毛派分子占据了很多重要职位，如媒体编辑、记者、大学教授及政府部门的要职。